



父辈丛书·图文版



我的父亲

WODEFUQIN
LUORONGHUAN

罗东进/著

罗荣桓

我的父亲罗荣桓

罗东进著 黄瑶执笔

父辈丛书·图文版

当我从儿子的角度缅怀父亲时，光环中的罗荣桓不仅仅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元帅，更是儒雅宽厚的长者！

——罗东进



辽宁人民出版社

© 罗东进 200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父亲罗荣桓/罗东进著.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3.11

ISBN 7-205-05400-1

I. 我… II. 罗… III. 罗荣桓 (1902 ~ 1963) —生平事迹 IV. 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7315 号

出版发行：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110003)

印 刷：沈阳新华印刷厂

幅面尺寸：142mm×212mm

印 张：12

插 页：1

字 数：325 千字

印 数：1 ~ 3,000

出版时间：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赵 炬 赵中男 娄 瓦

封面设计：杨 勇

版式设计：王珏菲

责任校对：刘再升

定 价：30.00 元

销售热线：024 - 23284300

23284296

献给我的父亲罗荣桓

——罗孚

“父辈丛书”编委会

主任：任慧英

副主任：阎景堂 陈志强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任慧英 李定国 陈志强

赵 炬 索世晖 阎景堂

目 录

一 我出生后，就叫东进，但却长时间弄不清准确的生日	1
二 1902 年，父亲出生于湘东一个偏僻的山村	3
三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呼声伴随着父亲度过中学时代	10
四 为了继续深造，父亲跑了四个大城市，进了两所大学	17
五 父亲率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因缘际会，参加了湘赣秋收暴动	29
六 母亲的家世与青少年时代	32
七 毛主席对父亲的考察，经历了从秋收起义到古田会议的过程	37

八 随着毛主席离开红军，父亲也离开了一军团。毛主席后来喟然长叹：“我倒霉时，他跟着我倒霉。”	57
九 在红军大学，父亲和毛主席再一次朝夕相处	60
十 我的哥哥的出生和夭折	66
十一 父亲奉命率部东进山东	75
十二 关于湖西肃托事件	88
十三 经营鲁南	106
十四 桃峪风波	115
十五 淄蒙反“扫荡”	121
十六 少奇同志来到山东	136
十七 一九四二年反“扫荡”和翻边战术	142
十八 甲子山战斗和父亲生病	149
十九 一元化领导和顶李送于	155
二十 大鼻子叔叔	167
二十一 有计划地反“扫荡”和局部反攻	171
二十二 发动大反攻	185
二十三 渡海	192

二十四 在沈阳、抚顺和大连	201
二十五 北撤	219
二十六 在莫斯科	228
二十七 组建二线兵团和诉苦运动	239
二十八 军工生产和后勤建设	247
二十九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254
三十 由打长春到决心南下作战	263
三十一 在辽沈战役中	270
三十二 在平津战役中	292
三十三 在天津	302
三十四 家事	308
三十五 建国后首任总政治部主任、总干部 部部长和政治学院院长	322
三十六 辞职以后	335
三十七 复出，父亲同林彪在学毛著问题上 的分歧	346
三十八 要反对空谈政治的倾向	362
三十九 人类庄严一典型	367

我出生后，就叫东进，
但却长时间弄不清
准确的生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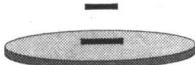
1939年2月14日(农历腊月二十六日)，我出生在山西省长治市常村。

我出生时，父亲正率一一五师东进。他得知母亲即将分娩后，匆匆从部队赶到母亲所在的村子，在堂屋等待着我呱呱落地。当屋内响起我第一声啼哭，卫生员挑起门帘向他道喜后，他进屋看了看已经包裹好的婴儿。母亲请他给起个名字，由于部队正在东进山东，父亲略一思索，便给我起了“东进”的名字，随后便匆匆离去。

正因为戎马倥偬，父母对我是哪一天生的，都没有特别留意。母亲只记得她分娩时，村里的老乡已纷纷置办年货，因此知道我是腊月生的，哪一天却说不清楚。我的小妹罗宁是1951年1月21日出生的，那也在阴历腊月里。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就同她在同一天过生日。后来梁必业叔叔整理自己的战时日记，从他的日记上才找到我出生的准确日期。

人们填履历表时，经常会碰到一个项目：籍贯。籍指的是祖居地，贯指的是出生地。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的很长时间，社会变化很小。人们经常世世代代聚族而居。因此“籍”和

“贯”经常是一回事，人们便统称其为籍贯。但是，到了上一个世纪，中国社会进入一个激烈动荡、迅速变化的时代，情况就不同了。拿我来说，我的祖居地是湖南衡山，但却出生在山西长治，在出生地，我只待了一百天，便被挑夫挑到山东。如果有人问我的籍贯，或者通俗一点，问我是什么人，要回答时还得多费一点口舌。说我是衡山人，直到我成年后，我才第一次到那里寻根。说我是长治人，我只在那里生活了三个月，可以说毫无印象。说我是山东人，应当更接近事实，因为我的童年生活在山东，是山东的老乡用地瓜、煎饼将我哺育成人。像我这样一下子说不清楚籍贯的，在我的同时代人中很多很多。



1902年，父亲出生于 湘东一个偏僻的山村

我的父亲罗荣桓才是地道的湖南衡山人。他在 1902 年 11 月 26 日出生于湖南省衡山县鱼形镇寒水乡南湾村。我的祖先原来生活在衡山黑田，搬到南湾已经有好几代了。

在我父亲出生的年代，一个县管辖的范围比现在大。那时的衡山县如今已经一分为二。原衡山的湘江以西地区仍然叫衡山，湘江以东地区则另设了衡东县。南湾如今属衡东县。

湖南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地方。在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大门口有一副对联，上联是“惟楚有材”，下联是“于斯为盛”。这副对联反映了湖南“江山代有才人出”的盛况。19世纪末年，在这里涌现了许多追求维新变法的仁人志士，比如谭嗣同、黄遵宪、熊希龄、唐才常等等，他们邀请了鼓吹维新变法的主将梁启超到长沙主办时务学堂。后来讨袁护国的蔡锷就是这个学堂的学生。戊戌政变失败以后，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又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他们发动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于是，新一代革命者又继之而起。毛泽东是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我的父亲有幸参加了这一队伍的行列。

湖南所以人才辈出，说明它虽然不靠海，但在近代历史上也是得风气之先的地方。但相对于长沙、衡阳等地而言，我父

亲的故乡南湾就显得相当闭塞了。现在要到南湾去，交通非常方便。但在父亲的童年时代，那里却十分闭塞。那时京广铁路还没有影子，公路也没有。从南湾出来，无论是上县城还是到衡阳和省城，都要翻过一道山，在夏浦上船，顺洣水进湘江，然后或是南溯或是北去。同《浏阳河》这首民歌所唱的一样，也是“转过了几道弯，几十里水路到湘江”。不过浏阳河在北面，而洣水河在南面。

我们家是一个大家族。我的曾祖父罗汇吾自幼读书，但却没有考中秀才，一生以教书为业，生活非常清苦。到死的时候，只给后人留下一斗谷的田。我的祖父叫罗国理。他自幼跟父亲读书，字写得不错。按当时早婚的习俗，1888年，他十八岁就结了婚，十九岁便有了我的大伯父罗柏第。二十岁时，曾祖父去世。他不得不子承父业，接着教书，以挑起家庭的重担。不久，我的二伯父罗晏清、三伯父罗壬甲相继出世，家庭负担越来越重，当塾师已经不能养家糊口了。祖父便弃教从商，按现在的说法就是下海经商，在南湾开了一个兼卖中药的杂货铺。不久，便有了盈余，家道又走向小康。到20世纪初，我父亲出生的前后，他便当了黑田罗氏的征首(即族长)和南湾的团总。他还筹集资金，在南湾南头修了一座纪念黑田罗氏第十二世祖罗异山的祠堂。我父亲两三岁时，全家便搬到这座祠堂居住。

但是，我父亲幼年时并没有能过上多少天无忧无虑的舒心日子。1907年，也就是在他五岁的时候，我的祖父吃了一场官司。关于这场官司，《黑田罗氏九修族谱》中有一篇《国理君暨贺孺人寿叙》写道：



罗东进的祖父罗国理。

丁未之秋，土字横过冲赌戏焚台事起。莠魁旷甲林与班首唐某合谋，假名浏阳谭光禄祠祭器，诬讼国理君毁赃重案，又求得省城大绅王祭酒先谦、叶主政德辉、黎孝廉尚雯三书，抵县、府、道各署为奥援。知县王章祺无状，为所慑，宽匪纵慝，乃朱签传国理君庭讯；不到，又稟府提究。于是，郡县缇骑相望于道……

这篇寿叙对这场官司的来龙去脉说得不清楚，但有几点可以肯定：一、它牵涉到浏阳谭光禄，也就是谭嗣同的父亲，曾经当过湖北巡抚的谭继洵。而打官司的这一年，谭嗣同因为主张维新变法在北京菜市口遇害已经快十年了。他父亲也因此“忧惧而终”。二、仇家得到王先谦、叶德辉、黎尚雯的支持。王、叶既是著名的国学大家，又是湖南保守派的大士绅。他们在政治上同谭嗣同是死对头。三、由于仇家得到王、叶等的奥援，祖父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传讯他的兵勇衙役，头一拨刚走，第二拨又到，“相望于道”。祖父到省城上诉，又托人到北京上访。由于西太后死后，“朝廷昏乱”，上访无门，官司没有打赢。据“寿叙”说，在这场官司里，祖父“奔驰数百里，耗财近千金，频遭官吏之辱，百折不回，无少怨尤”。

这场官司有没有政治性，是非曲直如何，由于史料不足，无从判断。而对于当时才五岁的父亲来说，也是不可能闹明白的事。他看到的只能是家人的忧愁和惊慌，兵勇衙役上门敲诈勒索时的横行霸道，街坊中势利小人的白眼。祖父有时也会把他当成出气筒，没头没脑地给他两巴掌，……这些感性的现象给予他很深的刺激，他日后形成内向的、沉默寡言的性格，与此可能有一定关系。

我的祖母姓贺，是一个农民的女儿。“寿叙”中叙述她在那场官司中，识大体，支持丈夫，敢于同找上门来的兵勇衙役说理周旋，对仇家耍的一些阴谋诡计能够识破并一一化解，等等，称赞她“外柔内刚”，“明达机警”，是“寒林一枝之秀”。在日后的父亲身上，可以看到祖母性格的影响。

由于这场官司，家里伤了元气，很长时间没有缓过劲来。

1910年，我父亲八岁，祖父把他送到设在包老坳的私塾念书。早在1905年，清廷已经废除科举。在此前后，沿海各大中城市先后开办学校。但南湾比较闭塞，到辛亥革命前夕，仍然只有为科举服务的私塾而没有学校。

这种私塾同我们今天上的学校完全不同。大家如果读过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就可以大体知道这种不同在哪里。包老坳的私塾设在一座祠堂里，一头放着先生的书桌，一头是几张供学生围坐的八仙桌。学生们年龄不同，文化程度不一，各念各的书。先生一般实行个别教育。逐个把学生叫去，领着读几段书，然后学生就回到座位上自习。初级的念《三字经》、《百家姓》、《日用杂字》。程度高一点的念《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再高一点则读《诗经》、《左传》、《史记》等书。为了应考，还得学写八股文。那也是一种应试教育，但不是为了考大学，而是为了考秀才、举人。废除科举后，私塾的主要功能就是识字，再高一点就是能读古书，写一些文言的文章。还有就是吸收传统道德的一些教诲和训诫。私塾里缺乏自然科学和体育、音乐、美术的课程。

我父亲在入学前，在家就学过《三字经》、《百家姓》，还学过一些五言和七言的唐诗绝句。进私塾后就直接读《四书》。每天先生把父亲叫到他面前，领着读一段，回来便自己读到会背为止。那时的先生只教读，不讲解内容。因此，学生尽管能照本宣科，但并不懂得其中的意思。父亲曾经要求先生讲一讲，先生的回答是：读多了，就自然懂了。



罗东进的祖母罗贺氏。

父亲对背这么几段书，丝毫不感到吃力，用不了一会儿就能轻松过关，但就是感到比较乏味。念的时间长了，思想就会开小差，有时就会做做小动作或是同同桌的同学交头接耳。先生看到课堂的秩序松懈了，就会在桌上敲打一下戒尺，给大家以警告。有时老师有事出去了，学生们便停止读书，有的聊天，有的打闹。如果又有人开始读书，那就是先生已经回来的信号，于是，书房里便只听到一片琅琅读书声。父亲也掌握了这一规律。尽管他有时也做做小动作，但从来没有被老师发现过。

但是，有一天他却“失”了“手”。

那时，他和很多少年一样，喜欢用纸叠一些小玩艺儿。现在人们爱叠纸鹤，那时却爱叠桌子、椅子和猴子，更复杂一点的就叠小船。有一天，老师又出去了，我父亲拿出一张纸，专心致志地在叠一只小船，精神十分集中，已经忘记一切。老师回来了，他也没有察觉。这时，冷不防从他的背后伸过一只手来，把他叠的玩艺儿抽走了。他以为又是哪位同学跟他开玩笑，便信口骂了一句。只听得一声“放肆”，盛怒的老师让父亲伸出手来。父亲过去从没有挨过打，习惯性地伸出右手。老师便用竹戒尺一下一下抽打他的手心。我父亲性情是比较倔犟的。他挨了打不讨饶。老师认为他是不服气，打得就越凶，结果是把右手打肿了，回家吃饭连筷子都拿不住。从此他得到一个教训，老师再要打，就伸左手。但是这一条教训以后并没有用上，因为他再也没有挨过打。

对于这种体罚他十分反感，这倒不完全是因为皮肉受苦，而是认为它侮辱人格。他参加红军后，便同过去旧军队中流行的体罚士兵的恶习进行了不知疲倦的斗争。

小时候，我们常听父亲给我们讲这件事。他对我说：“我小时候上私塾念书念不好，是要挨老先生打的。现在没有竹戒尺打我们了，可是如果不自觉，不好好学习，将来会后悔的。社会的‘戒尺’会打我们的。”以此鞭策我们好好学习，不要懈怠懒惰。

1914年，闭塞的南湾终于在一个祠堂里开办了岳英小

学。此时父亲已经十二岁，拿到现在已经是上初中的年纪，但他刚上小学。因为他已经有了几年私塾的底子，直接读高小。他按照族谱，原名镇慎，字雅怀，号宗人。进学校后，校长罗炳文给他起了学名：荣桓。以后他便一直使用这个名字。

在小学，他第一次接触到数学和自然等课程，并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前，他受祖母的影响，也曾相信菩萨。学了自然课程，知道这些原来都是迷信。

据上世纪 80 年代仍然在世的我父亲的同学罗云阶回忆，进小学不久，父亲就和他共同进行了一次反迷信的“密谋”。

在南湾街上有一座关帝庙。街坊们都传说，这庙里的关圣大帝最有灵验了。遇到灾荒、疾病，人们就到这里来烧香、叩首，祈祷关老爷保佑自己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老人们常说，对关帝的神像必须恭敬，不能亵渎。谁要是用手指头指一指它，就会肚子疼。学了自然，对刮风、下雨、电闪、雷鸣等自然现象获得了科学的解释后，父亲和罗云阶便对关帝老爷的灵验发生了怀疑。他们打算试一试。在相传是关帝生日的头一天傍晚，他们二人背着盛有狗屎牛粪的粪筐悄悄溜进关帝庙。他们知道，在关帝神像的肚子里放有盐、茶、稻谷，便把这些东西掏出来，再把狗屎牛粪塞进去。第二天，很多人来进香，有人鼻子尖，时间不长便闻到了神像跟前的臭味，经过查看，终于发现了关帝肚子里的东西被人掉了包，于是引起一片哗然。我父亲和罗云阶忍住笑离开了现场。

关帝庙事件发生后，南湾平安无事，我父亲和他的同学也平安无事。从此，他们就再也不信神了。

我曾经读过孙中山的传记。他在青年时代曾经为宣传破除迷信而折断过家乡北极观中玄天大帝神像的手指。我母亲比我的父亲小一轮——十二岁，她在少年时代也曾在当地的进步青年的带领下到庙里打过菩萨。孙中山折断神像的手指是在 1893 年，到我母亲参加打菩萨已经是 1930 年前后的事了。从 19 世纪末年到我的父母生活的年代，破除迷信恐怕是他们那几代人共同的心路历程。此后，父亲由于对自然科学产生浓厚的兴趣，日后便立志向理工科方向发展。



我父母那几代人还有一个共同的心路历程就是对于国家蒙受的耻辱感同身受。早在上私塾以前，祖父在家就教我父亲读《三字经》。清末民初修订过的《三字经》就有“同光后，宣统弱；我中国，地日削”这样的字句。中国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国力还是强盛的。但是，由于沿袭古老的封建制度，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不进行改革，便日益落后。落后就要挨打。1840年鸦片战争后，国家便成为列强宰割的羔羊。在挨打后被迫签订的一连串不平等条约使国土大片大片沦丧。我父亲同当时广大的青少年一样，在这种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充满了忧患意识。

按当时的学制，高小是三年。1917年，我父亲高小毕业。按他的愿望，自然是继续读中学为好。但是，那正是军阀混战的年代。在湖南，北面有皖系、直系的北军，南面有湘系、桂系的南军。双方你打过来，他打过去，湘江两岸人民备受摧残。我父亲想读中学就得到省城或是衡阳，在兵荒马乱之中，这是难以做到的。于是，他只得又回到私塾去读古书。直到1919年夏天，他才离开南湾，到省城求学。